



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研究報告系列

第一百一十七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中國的崛起與城市與經濟空間在全球範圍的重構》

李思名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講座教授暨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所長、
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理事

王珺

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助理教授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is an endeavour of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a consortium with 28 member universities, to foster dialogue amo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ast-West studies. Globalisation has multiplied and accelerated inter-cultural, inter-ethnic, and inter-religious encounters, intentionally or not. In a world where time and place are increasingly compressed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grows in density, numbers, and spread, East-West studies has gained a renewed mandate. LEWI's Working Paper Series provides a forum for the speedy and informal exchange of ideas, as scholar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ttempt to grapple with issues of an inter-cultural and global nature.

Circulation of this series is free of charge. Comments should be addressed directly to authors. Abstracts of paper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LEWI web page at <http://www.hkbu.edu.hk/~lewi/publications.html>.

Manuscript Submission: Scholars in East-West studies at member universit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ubmitting a paper for publication should send an article manuscript, preferably in a Word file via e-mail, as well as a submission form (available online) to the Series Secretary at the address below. The preferred type is Times New Roman, not less than 11 point.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will review all submissions.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not to publish particular manuscripts submitted. Authors should hear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about the review results normally within one month after submission.

Copyright: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copyright remains with the author. Please do not cite or circulate the paper without the author's consent.

Editors: Ah Chung TSOI, Director of LEWI; Emilie Yueh-yu YEH, Cinema & TV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LEWI.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From HKBU: CHEN L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Martha CHEUNG,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ivienne LUK, Management; Eva MAN, Humanities; TING Wai,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NG Man Kong, History; Terry YIP,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outside HKBU: Paul CROWE, David See-Chai Lam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Disclaimer: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and its officers, representatives, and staff, expressly disclaim any and all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for the opinions expressed, or for any error or omission present, in any of the papers within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All opinions, errors, omissions and such are sole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 Authors must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use of non-published and published materials,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 and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ny such errors.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Tel: (852) 3411-7273; Fax: (852) 3411-5128
E-mail: lewi@hkbu.edu.hk
Website: <http://www.hkbu.edu.hk/~lewi/institute.html>

《中國的崛起與城市與經濟空間在全球範圍的重構》¹

李思名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講座教授暨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所長、
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理事

王琚

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2008 年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嘯可能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轉捩點。中國經濟歷短暫放慢後再次高速增長。正當美國和大部分歐洲國家仍然因為國家債務問題，再次陷入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國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大部分評論家預計，中國的 GDP 將於 2025 年左右超越美國。這將是中國自 19 世紀被英國超過後，再次登上世界經濟寶座。

包括城市和經濟地理學在內的當今社會科學，基本上以西方、特別是英美等英語國家為本位。有關的理論，大部分是針對英美和其他西方先進國家的狀況。其中，有關全球化的理論，包括後福特主義、跨國企業壯大等，以及由此引伸的世界或全球城市體系理論、主權國家權力衰減論、地理否定論等，基本上是針對新自由主義下資本主義運行規律的認知和論述。至於一國之內的區域結構以及城市內部空間組織研究，例如城市蔓延、城市多核心化等，也莫不是以美英等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為藍本。

中國的崛起勢將重繪整個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地圖。可見將來，中國仍然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在共產黨、有著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體。以中國為基地的跨國企業，基本是大型國企，其投資行為和運作模式，跟一直以來主導全球經濟的西方跨國企業有著極大的差異。在城市建設這個層面，在經濟全球化下，西方學者給予城市政府一個較重要的位置。相對而言，中國的地方政府對比西方的城市政府受到更少制約；同時，與地方政府組成聯盟的主要是擁有高度影響力和廣泛人脈關係的大型國企。這在在說明主流的城市和經濟地理理論需要作出調整，以適應中國和世界新的客觀情況。

關鍵詞：中國崛起、世界政治和經濟地圖、城市和經濟地理、新自由主義、中國的跨國企業

¹ 本文基於於《全球化下的 ECFA 時代兩岸新關係暨第十四屆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國際會議》(臺灣、宜蘭、2011、5、18-19)所發表的文章修改。² 參見世界銀行國內生產總值排行表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anking table), 網址 <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gdp.pdf>

一、導言

過去二十多年，不少西方政治經濟學家和評論家不斷強調中國經濟結構上的缺陷。例如：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 (Scott et al., 2001 ; Pei, 2006 ; Huang, 2008) ，特別是強大的黨和國家機器以及保守的政治取向 (Gabriel, 2006 ; Hutton, 2006) ，大大制約制度和產品與技術的創新 (O'Connor, 2009) 。雖然市場化、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論述，充斥著中國改革議程的各個方面 (Breslin, 2006) ；但是，「抓大放小」和「做大做強」的「企業改革」，實際上造成國進民退的局面，即不斷加強大型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私人企業舉步維艱 (Qin, 2005 ; Qin, 2010 ; Zhou, 2010) 。缺乏清晰的產權界定 (Kornai and Qian, 2009 ; Walder, 2011) 和軟預算 (Kornai, 1986) 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一大特色，因此而造成的過度投資，更帶來嚴重浪費和各種形式的環境問題 (Shao et al., 2006, Chen, 2007) 。黨國體制下的市場化改革，所產生的是無處不在的貪污和尋租 (rent-seeking) 行為 (Wedeman, 2003) ，以及因產權缺乏明晰界定的狀況下進行的各種次優化 (sub-optimal or sub-Pareto) 投資行為 (Walder and Oi, 1999) 。

改革初年的權力下放，促使地方政府和所在地的國有企業以及國有商業銀行形成一個增長綜合體 (growth coalition) 或地方發展政體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 (Zhu, 1999) ，大大加強地方經濟發展動力；不過，同時也加劇了軟預算和過度投資產生的問題，導致銀行呆壞賬比例偏高，對金融體系以及整個國民經濟構成嚴重威脅 (Boyreau-Debray and We, 2005) 。過度投資的其中一個表現，是房地產近似無序開發，房地產市場成為投機者樂園 (Guo and Li, 2011) ；再者，與舊城重建和向周邊農村徵地相關的抗爭 (Lin, 2009, Hsing, 2010) ，以及不斷攀升的房價，造成社會廣泛不滿 (Lum, 2006) 。相當部分評論者認為中國的經濟無可避免出現硬著陸，並衝擊中國的黨國體制，最終引發革命，甚至國家分裂。在西方，以至在港、台和日本，中國崩潰論有一定市場。

但是，直到今天，有關中國崩潰的預言一一落空。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克服了一個接一個的困難，持續以超過 10%年經濟增長率高速成長。1997-98 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的影響十分輕微。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迫使中國讓主宰著世界經濟的歐美跨國企業進入本國市場；事後證明這並沒有對中國的企業構成太嚴重的衝擊，反而為中國的大型國企和私營企業提供“走出去”的一個機會。2008 年席捲世界的金融海嘯更可能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轉捩點。中國以及除了日本以外的整個東亞和南亞經濟，經歷短暫放慢後，再次以極高的速度增長。正當美國和大部分歐洲國家仍然為如何處理國家債務問題而再次陷入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國於 2010 年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² 相當部分評論家預計，中國的GDP 將於 2025 年左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³ 最近，個別組織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April 2011) 更把這個時間，推前到 2020 年甚至乎更前⁴。

以天朝自詡的中國，自 19 世紀工業革命被英國超過後，勢將再次登上世界首席經濟體寶座。這個劃時代里程碑的重要性，特別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而言，不言而喻。最近，美國奧巴馬總統和克林頓國務卿一再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而西方傳媒也不斷渲染中國崛起對周邊國家以至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威脅，東海和南海的主權爭端更是西方政客和傳媒炒作的藉口。

某種意義上，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可看成一個錢幣的兩面，代表西方國家對整個世界政治和經濟地圖需於短期內作根本性重繪所產生的恐懼。自 15 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西方列強差不多把整個地球置於其殖民和半殖民統治之下，並因此而逐步建成統一的全球性市場。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新的名詞；不過，事實上經濟全球化進程，過去數百年不斷往縱深發展。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紛

² 參見世界銀行國內生產總值排行表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anking table)，網址 <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gdp.pdf>

³ 據普華永道國際有限公司 PwCIL 的報告《2050 年的世界：金砖四國之外》“The World in 2050: Beyond the BRIC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中國將於 2025 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系。Economic Watch 則將將這一時間點預測為 2025 至 2030 年之間。

⁴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於購買力平價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a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預測，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 2016 年將升至十九萬億美金，而同期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則為 18.8 萬億美金。亦即，中國佔全球比例 (18%) 將超越美國 (17.7%)。此後，中美之間的差距亦將持續擴大。參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2001 年四月發表的報告《全球經濟前景展望》。

紛獨立；但是，以西方為基地的跨國企業某程度上替代了主權國的位置，把整個世界置於其生產配置和銷售網絡之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同屬西方陣營但卻位於東方的日本，進佔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西方國家便深感不安。今天，仍然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能夠崛起，甚至挑戰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對西方而言，更是嚴重的挑戰。

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當然是重要的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問題；同時，也是包括經濟地理和城市與區域研究在內的社會科學需要論探討的問題。十三億人口、經濟總量全球第一、有著五千年從未間斷文明的大國，對世界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環境的影響，需要學術界做多方面的探索。就此，在下文我們作初步嘗試。

二、經濟和城市地理學與相關理論簡介

英語世界的主導地位

理論上，社會科學應以本地區或本國為主要研究對象。但是，長期以來西方主導學術研究，包括經濟地理學和城市與區域研究在內的當今社會科學，基本以西方特別是英美等英語國家為本位。有關的理論論述，大部分是針對英美和其他西方先進國家而構建 (Yeung, 2003)。近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英語作為國際商業和政壇上的語言地位不斷上升；在學術界，英語形成的霸權同樣不斷加強。在這個背景下，英美兩國在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導地位更顯突出。所謂國際學術期刊，基本上就是英國和美國的期刊。不管身在何處，當今學者追求的，就是在一級國際期刊發表文章。中國大陸、台灣、香港、韓國的主要高等院校，紛紛以此作為邁向國際一流大學的門檻，以及對本校各學系和教員評核的標準。雖然，歐美經濟當前面對相當困難，東亞、南亞、拉丁美洲等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所佔份額不斷上升；但是，西方，特別是英美兩國，仍然在國際政經論述和學術研究等領域，擁有幾乎絕對的話語權。

新自由主義與城市和空間經濟學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主導政策論述，市場力量被視作經濟發展以至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保證 (Friedman, 2005, von Hayek, 2005)。芝加哥學派 (Chicago boys) 在智利皮諾切特政府 (Augusto Pinochet) 下的改革，英國的撒賽爾主義 (Thatcherism)，美國的列根經濟學 (Reagonomics)，中國的改革開放，前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變天，經濟的全球化等等，皆被看成市場萬能的佐證。特別是以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基本上建基於對市場的膜拜。就城市研究而言，可視作城市經濟學核心的 Alonso-Muth-Mills 城市空間模型 (Alonso, 1964, Mills, 1967, Muth, 1969, Glaeser, 2008)，以及 Fujita 和 Ogawa 等就美國普遍呈現中心城市衰落以及都會區遠郊形成的所謂邊緣城市 (edge cities) 而建構的多中心模型 (Fujita and Ogawa, 1982)，都是建基於均衡競爭和暢通無阻的市場運作的假設之上。在人口密集和經濟活動頻繁的城市，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空間外部經濟 (spatial externalities) 元素充斥。過去，空間外部經濟的普遍存在，一般被視作導致市場失效的主因，需要國家或政府有形之手作出更正。然而，高斯定理 (Coase Theorem) 指出，清晰的產權界定不單是市場建立的基石，同時，也是解決城市充斥著空間外部經濟導致市場失效的鑰匙 (Heikkila, 2000)。在經濟學家眼中，除了適當的產權界定外，國家或政府能夠扮演的角色實在越來越少。

經濟和城市地理學對晚期資本主義的論述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城市和經濟地理學與城市和空間經濟學分道揚鑣，並越走越遠，以至相當部分經濟地理工作者認為，當今的經濟地理學和以經濟學家為主的“新經濟地理學”屬於兩個世界 (Peck and Sheppard, 2010)。雖然兩者都以空間為研究對象，但是，跟後者不同，城市和經濟地理學研究對市場至高無上的信念抱相當懷疑的態度。今天的城市和經濟地理學，更為注重歷史的特定性 (historical specificity)，以及分析個人、社群、階級和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權力關係，集中探討西方晚期資本主義 (late capitalism) 發展的態勢。最關心的問題，相信是在晚期資本主義中，如何構建或是重新構建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生產和生活空間，以及構建過程中上述各種關係所產生的影響。

大多數論述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中，以單一性的大規模生產為主導的福特主義（Fordism）生產方式，逐步被後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和公司組織所取代。後者的特徵包括：容許生產線快速重組的模組化生產（modular production）和電腦程式的廣泛使用；規模經濟主要透過生產範疇擴大與模組化生產和多層次的承包關係而達致；產品深度分化和針對特定市場的生產（niche market production）；對市場變化作迅速回應的高度能力；無縫的生產和銷售銜接（just-in-tim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JIT）以及相關的物流業發展等 (Dicken, 2011)。

一方面，後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促使以不斷創新和極其快速的產品更新換代為特徵的新形式空間集聚，以及美國矽谷等高新科技區域的形成和壯大 (Scott, 1998)。另一方面，模組化生產和多層次承包，加上通訊和運輸技術的飛躍發展，為全球性生產鏈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讓跨國企業能據此在不同地區和國家設置生產線，以獲取生產成本在不同地區和國家間些微差異所產生的利潤。與此同時，與殖民地時期殖民地為宗主國種植或開採期工業生產所需原材料的分工模式截然不同，個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在“新國際勞動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下 (Fröbel et al., 1982)，成為跨國企業全球性生產鏈的一個部分，從而晉身為新興工業國（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Yusuf et al., 2007)。再者，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導下，各國政府無不致力消除各種形式的管制，開放本國的產品和資本市場，以求達致資源配置和生產效率的最優化。這等等，都為跨國企業運作日益全球化，提供相關的制度基礎和利潤誘因。

雖然，跨國企業得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生產和銷售部署，相當程度上依靠其所屬國家在國際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影響力；但是，跨國企業和所屬國家之間的利益很多時未必一致。作為一個企業，前者主要以營利和市場佔有率最大化為依歸；作為代表全國所有人民的政體，後者需確保國家的整體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照顧國內不同群體的利益，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政經關係。個別論者基於跨國企業對全球經濟運作日益重要，甚至佔有主導地位，提出所謂“主權國家權力衰減論”（Withering of the state hypothesis）(Dicken, 2011, Chapter 6; Evans, 1997, Weiss, 1997, Mittelman, 2000, Brenner et al., 2003)。

其主要論點是：跨國企業在其全球範圍的重組，往往會犧牲其所屬國家的利益，特別是導致過去的工業生產基地荒廢，大量工人失業，加劇收入的兩極化。主權國家難以扭轉這個趨勢。包括希望該等企業保留原生產基地的所屬國，和為了吸引其海外直接投資的其他國家，往往為跨國企業提供諸如減免稅負、廉價土地、簡化進出口規條等多方面的優待。跨國企業之間有著暨競爭又聯合的合縱連橫關係，不同國家的跨國企業為了共同利益共組聯盟，有時甚至置本國利益不顧。在這同時、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國際貨幣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地位則日益重要 (Peet, 2007)。在這個背景下，主權國家對本國經濟決策的制定能力，不斷受到挑戰，並因而大大萎縮。

世界或全球城市

對跨國企業環球性投資決策和日常營運而言，大量資金的取得、無障礙和快速的跨境資金流通、可靠的資訊掌握，以及企業內各部門、各分公司主要負責人之間、以至和合作夥伴甚至競爭對手之間面對面的匯報和溝通，至為重要。因此，跨國企業的總部以及其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地區總部，有必要設置於世界性和地區性金融和信息中心以及通訊和交通樞紐，也就是本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最主要城市和政治和經濟決策中心。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表現，是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和富有投機性的投資組合資金在全球範圍的高速流通，以及金融業和與之有密切關係的保險、會計、法律諮詢、財富管理、物流等高端服務業的高速發展。加上上述以高新產業為主體的新空間集聚區的形成和發展，城市和城市區（群）作為經濟活動載體的地位大大提高，少數個別城市或城市群對全球的經濟發展軌跡的繪製，扮演至為重要的角色。一個由全球或世界城市組成的全球性空間經濟系統逐漸浮現 (Sassen, 2001, Scott et al., 2001)。

企業城市假說與有關理論

如何在不斷加劇的競爭中屹立不倒，並晉身成為世界城市的一員，是當今不少城市政府需面對的問題和政策制定目標。相當部分學者指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城市發展政策和措施、例如公共住房的提供、市區重建等、主要為了達到收入再分配的目的。然而，今天城市政府的首要工作，卻是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為此，不少城市政府着眼於城市品牌的建立和各種形象工程，一方面致力建構一個現代化和富有活力的營商形象，但另一方面卻又同時標榜對歷史文化的尊重，加強對古老建築和舊城區的保護和“活化”，使整個城市充滿文化和節日氣息。從而達到吸引各類型高端人才，加強旅遊業發展，促進城市投資的目的。“企業城市假說”（urban entrepreneurship thesis）(Harvey, 1989)、 “政權論”（regime theory）(Stone, 2005) 和“成長機器論”（growth machine hypothesis）(Molotch, 1976)，可以看成當今城市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論述。跟據上述理論，城市市政府為了促使城市經濟發展，往往與大企業結盟，特別是和房地產開發商組成增長聯盟（Growth alliance），推動各種大型城市發展項目。在這同時，當地居民特別是社會貧困人士的利益，往往被忽略。

三、西方理論對當今中國劃時代的城市與區域轉化的適用性

中國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不可或缺成員

以上的簡介，當然無法概括當今主流城市和經濟地理學以及相關學科理論的複雜性和內涵的豐富性。例如，個別論者對所謂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以及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的普遍性抱有相當懷疑；也有論者認為全球生產線的出現，並不否定企業的地方鑲嵌性（local embeddedness）以及跨國企業的國家屬性 (Dicken, 2011)。事實上，這篇短文只能觸及城市和經濟地理學的九牛一毛。不過，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借此探究西方理論，對分析和理解當今中國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城市化和區域演化過程的適用性，並就此嘗試探討中國崛起對修訂城市和經濟地理學及相關學科理論的重要性。

我們認為有關的探索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在持續的金融危機下，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歷程已經出現一個轉折點。不論在全球範圍，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

包括國家之間在城市及區域層面的競爭形態，以及主權國家與跨國公司之間的相互關係等；還是在一國之內，國家與各社會團體和普通百姓之間的互動過程，都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 (Sassen, 2006)。這種力量對比轉變表現於不同方面，包括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性質與推動機制的改變，以及一國之內不同區域和城市之間的不對稱發展形態等。

隨著中國重新投入世界經濟體系，以出口加工為啟動點的東部沿海地區迅速成為經濟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而中國很快也被冠以世界工廠的“美譽”。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便不斷批評中國的廉價輸出，導致世界貿易不平衡。中國參與世界性產業分工，促使世界經濟在全球範圍高速重組，加速西方國家傳統工業在本國生產的萎縮，傳統的工業區紛紛淪落成“鏽帶” (rust belt) 或廢墟，大量工人因而失業。不過，直至最近，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才比較經常以此實施針對中國進口而制定的諸如“反傾銷”、“反補貼”等保護主義措施。

事實上，這種情況對歐美而言並非全無益處。傳統的商品生產快速往中國和其他低成本地區轉移，大大制約一般商品零售價格的升幅。再者，透過這個過程，西方先進國家可集中投放有限的生產要素，發展其擁有絕對優勢的高附加值產業。後者包括金融、法律、顧問諮詢等高端服務業，也包括微電子、新材料、生物技術等高新製造業和有關的研發工作。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頭七八年，美國等西方國家因此得以擺脫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滯漲”，享受一段頗長時期高增長但低通脹的繁榮日子。中國和其他有大量貿易盈餘的國家長期大量購買美國國債，更促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貸利率長期走低，助長房地產市場升溫，並產生巨大的財富效應；相當部分國民因此感覺良好。也許，伴隨著這個繁榮期是不斷加劇的國內不同區域之間和一個都會區內不同社區之間各種地理尺度上的空間不平衡，以及因此而造成廣泛的個人和家庭經濟上和心靈上的損失。但是，以空間不平衡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城市和經濟地理學及相關學科，主要精力投放在後福特主義下的彈性積累以及歐美高新科技集聚區作為全球經濟成長龍頭；似乎並沒有投放太多注意力，嘗試找出減低因全球性產業大規模和快速的空間轉移加劇“鏽帶”鏽蝕速度的有效方法。2008 年雷曼倒閉以前，西方主流的城市和經濟地理學對全球化下貿易

不平衡所產生的非生產性資金流動，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房地產泡沫及其爆破的可能性，更鮮有分析 (Harvey, 2011, Martin, 2011)。

國家在當今中國工業化進程和中國跨國企業出現所擔當的角色

踏進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逐步邁向新台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速西方跨國企業把傳統加工工業往中國轉移。替西方跨國企業的加工生產，持續佔中國出口貿易很大比例。但是，為了減輕加入世貿對中國本身企業的衝擊，中國政府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企業改革，便以“抓大放小”、“做大做強”，作為政策指導思想。在這個背景下，近年，中國本身的重化工業和技術含量較高的微電子、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和醫療科技、航天科技等工業，都有長足的發展。一方面，中國佔全球海外直接投資（FDI）輸入國首一、二位；另一方面，中國最近也成為主要的 FDI 輸出國。相當部分國家重點發展的大型國有企業，例如中石化、中國鋁業、中國有色等，以及個別在國內佔龍頭地位的私營企業或私有化的國營和集體企業，例如聯想、百度、長虹電子等，紛紛響應國家“走出去”的號召，在海外設廠或收購海外資產，成為以中國為基地的跨國企業 (Yeung and Liu, 2008)。有百業之母之稱的銀行業，其走出去的態勢更為明顯。中國工商（工行）、中國建設、中國銀行（中行）等國有商業銀行，紛紛在海外設立分行；並且積極與摩根大通、花旗、美銀、匯豐等世界性商業和投資銀行，建立相互控股的夥伴關係。

中國自推動改革主張以來，便充塞著諸如商品化、市場化、政府退出住房和醫療保健系統等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事實上，市場力量今天已經滲透到包括教育、福利提供等幾乎所有傳統政府職能。根據重要的社會政策來衡量，今天的中國比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不少方面更切合新自由主義的論述 (Liew, 2005)。再者，中國近三十年的資本積累，相當程度上依靠對以億計的城市新移民或農民工近乎放任的剝削。詭異的是，這樣大規模自由放任的剝削，主要建基於二元以至多元的戶籍制度下嚴重分割的勞動市場 (Whyte, 2010)，以及中國各級政府為了吸收 FDI、推動本國和本地區經濟，容許甚至鼓勵海外的跨國企業肆無忌憚地掠奪本國和本地區的自然和勞動力資源。這樣的資本積累模式正好說明，在中國，國家並沒有在新自由主義

的裝扮下退卻；與此相反，中國的各級政府在中國當今的資本積累過程一直扮演著主要推動者角色；而且，隨著時間推移，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對經濟發展策略和路線圖的制定，採取更為主動的舉措。

具體的表現包括：中央政府大量向國有商業銀行注資，為後者在上海和香港上市集資奠下穩固的基礎。今天，以市值計算，工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建行）晉身世界首一、二位。由於有國家作為後盾，國有商業銀行得以吸收民間大量低成本存款，並貸於企業和地方政府。後者以此“築巢引鳳”，大量投資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修建高新產業園和大學城，設置重點實驗室，加強本地區的研發實力，並進行不同形式的形象工程，構建現代化氣色。同時，地方政府也利用戶籍的授予、高級住房的提供、稅負的減免等優惠，吸引所需的人才。

改革初年，“政企分家”便提上議程；今天，大部分大型國企在上海、香港、紐約、新加坡和倫敦等地的證券市場上市，當然，這包括上述的國有銀行都是上市公司。然而，直到今天，包括預算軟約束 (soft-budget constraint) 在內的計劃經濟體制，仍然深刻影響著所有國有企業的運作。以銀行為例，無論是工行、中行或建行的負責人，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高層和中國政府前官員；而且，他們之間常常更換位置。國家政策主導著國有銀行的運作，包括在全國範圍和個別地區為特定行業貸款的傾斜。由於國家的參與和推動，包括透過大型國有銀行在融資提供方便，中國的基礎建設在某些方面，例如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的規模，已經超越不少西方國家的水平；中國的企業，也因此得以“做大做強”，並於短時間內“走出去”，成為跨國企業。

這個以國家為主軸，但又伴隨濃厚新自由主義論述和近乎對民工無制約剝削的發展歷程，跟西方主流經濟地理學所描繪的後資本主義資本積累形態，例如金融業的積極參與地區經濟事務，特別是與房地產發展相關的項目，以及地區之間競爭的加劇，有不少共同的地方；但是，本質上卻有相當大的分歧 (Breslin, 2006, Nonini, 2008)。在中國，黨和國家的絕對領導地位並沒有隨市場化改革而有所改變 (Chu and So, 2010)，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並不需要面對選民和非政府組織和壓力團體的質詢和制約 (Wright, 2010)。

西方經濟至今未能擺脫自金融海嘯以來的衰退，歐債危機甚至動搖歐羅區以至整個歐盟的基石。此消彼長下，可見將來，中國的跨國企業在環球經濟新一輪重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置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今天，中共仍然牢牢掌握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各個方面。不單國有企業須聽命於其黨委書記，就是比較大型的私營企業也置於黨的領導之下。為此，個別私營企業的老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黨大會的代表。可以想象，這些主要由大型國有企業組成，並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跨國企業，與傳統的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基地發展起來的跨國企業，在經營環境和決策機制上，有很大的不同。目前，西方的跨國企業，仍然是推動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而且，西方國家更掌控了國際媒體的話語權，對以中國為基地的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包括對西方國家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大肆評擊，認為是對環境資源的掠奪，置有關國家於中國影響之下等。但是，這難以改變中國跨國企業“走出去”的態勢。有關的發展，對全球生產供應鏈的重組，中國和其它國家的跨國企業之間的互動，地緣政治發展的態勢，經濟空間集聚的形式，以及民族國家和城市政府之間關係，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仍有待觀察和研究。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城市化形態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城市化和與此有密切關係的住房商品化和私家車的普及化，可以說是中國中央政府和各地的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措施。為了減輕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的衝擊，當時剛上任的朱熔基總理於 1998 年 3 月，宣布停止福利分房，並確認房地產和汽車製造為經濟增長點（Li, 2005）。某一程度上，這是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城市化和郊區化經驗學習。但是，至少在公開的政策文件，美國政府並沒把城市化和郊區化視作促進經濟發展的策略。在美國，擔當著推動城市化和郊區化至為重要的角色有：洲際公路發展計劃和住房金融改革。前者的主要出發點是國防需要；後者則為促進自有住房普及化。

然而，中國政府自第十個五年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十五，後改稱規劃）開始，便明確把城市化寫進指導國家發展策略的五年規劃。自此以後，中國的多項工

業生產，包括鋼材、水泥、鋁板、強化玻璃、家電、汽車等，逐一執世界牛耳。龐大的生產規模，對落實企業“做大做強”的發展策略，有莫大的幫助。高速城市化的其中一個表現，是巨型城市連綿區 (mega-urban region) 或城市群的出现。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唐城市群等，相繼顯現其巨大的磁吸力，和對全國以及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內陸迅速成長的城市，如重慶、武漢等，也相繼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增長極，輻射周邊地區。當然，數以億萬計的農民工，一直都是中國驚人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大量的來自農村的移民湧往各大城市和城市群；今天，中國有七個擁有超過 1000 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⁵。最近麥肯錫國際研究所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預測中國的巨型城市，將會在未來十五年內壟斷整個世界的城市經濟增長⁶。

就城市內部而言，很多城市熱衷於把周邊的縣轉為市轄區，以及建設形形色色的開發區。於此同時，史無前例的房地產開發熱潮正在蓬勃興起，各種各樣的封閉型住宅社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此前的單位大院日漸被商品房社區取代。很多 1949 年前建成的老城區，被成片推倒重建；代之而起的是令人目眩的政府大樓、歌劇院、會展中心等公共建築、寬敞氣派的廣場，以及高聳的“智慧型”辦公樓和豪華公寓等。新的商務中心區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 在許多城市拔地而起，例如上海的浦東新區和廣州的珠江新城。建設這些新商務中心區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吸引本國和境外的跨國公司在這裏設置中國或地區總部。另外一項為許多中國城市所熱衷的項目，是通過舉辦國家級和國際級的節事活動來展示城市建設的成就。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著名的如北京舉辦的 2008 年夏季奧運會、2009 年上

⁵ 根據 2010 年做進行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目前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有：重慶，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廣州。哈爾濱。

⁶ 麥肯錫國際研究所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於 2011 年發表的報告《城市的世界：描繪全球城市經濟實力》。報告中預測，至 2025 年，世界城市經濟實力秩序將重新排列。在當年國民生產總值居於前十的城市中，上海，北京，以及深圳上榜，而年均國民生產總值上升幅度排列中，位於前十的城市有九個來自中國。

海世博會和 2010 年廣州亞運會。無一例外，這些盛事都被當局作為提升城市形象的良機，其中尤其是交通設施和服務的提升最為顯著。

驅動房地產投資和城市建設熱潮的是土地商品化。中國的土地商品化制度借鑒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於上世紀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落實執行。自此，土地出讓金成為城市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Lin, 2007）。城市政府是土地批租市場上的壟斷者，不僅單獨擁由農地轉為非農建設用地的審批權，而且有權以很小的補償價，強行徵收市區周邊的農村集體土地。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城市政府建立了形形色色的房地產開發企業進行房地產投資。目前，這些房地產開發企業大部分已經轉為私有企業；但是，他們跟當地政府有著難以切割的千絲萬縷關係，往往能夠因此而低價取得大片珍貴的土地；當中，有為與郊區的農地，也有透過強制徵收大片舊城區物業所獲得的城市中心區土地。

不少大型國有企業，在所謂前三十年（1949-1978）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無償獲得了大片城市土地的使用權。在土地商品化導致的級差地租產生的地租差（rent gap）驅動下，這些國有企業也熱衷於設立自己的房地產開發分支公司，通過開發改造本單位大院的土地，以牟取暴利。本來，單位大院的商性開發，須通過市政府的地政和規劃部門審批，以確保符合本市整體發展規劃，並得向當地政府繳交相當於地租差總額的國有土地轉讓費。但是，由於這些企不少直屬中央各部委，市政府往往難以向其徵收土地轉讓費，而相關的規劃部門也難以確保有關發展符合規劃指引。

面對巨大的誘因，市政府、發展商、本地的大型國有企業以及事業單位，都成為推動城市土地開發的重要個體。共同的利益，以及深深鑲嵌的政企層系關係，使規劃控制往往流於一紙空文。加上國有商業銀行為資金籌措提供極大的方便，房地產開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在全國各地開展。規模龐大又近乎無序的城市往外擴張和舊區重建，可以說是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寫照。

中國城市發展形態，例如，強烈的蔓延態勢（urban sprawl），明顯的多中心性（poly-centricity），以及城市政府與房地產開發商和其他企業間形成的增長聯盟（Zhu, 1999），跟以英美經驗為核心的主流城市發展理論所描述的，存在頗多相似之處。

不過，在中國，城市土地發展背後的動力和機制，包括國企在中國架構的位置，市政府和發展商的同質性，以及城市增長聯盟和周邊農村建極端不等權利關係，跟西方國家城市所面對的，有著明顯的分別。在追求國際化和全球城市地位的過程中，中國城市政府表現出來的企業化傾向，比對西方的城市政府的更為突出。在黨國主導的體制下，中國各級政府在引導城市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影響力，西方國家的政府無疑難望其項背。

二元化的城鄉經濟與中國的城市化

影響中國城市化和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制度因素，是二元或多元的戶籍制度及與之有密切關係的土地權屬性，即城市土地屬國家所有，農村土地屬集體所有。為了推動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一直人為地壓低農產品價格，同時提高一般生活用品以及農耕設備的價格。改革開放初期，這個狀況沒有實質改變。長期的價格剪刀差，大大拉大城鄉差距。隨著人民公社的瓦解，糧食配額制的終止，居民身份證的頒發及因此而帶出的出行自由，制約人民遷徙的機制逐部減低（Li, 2005）。結果顯而易見，大量農村人口往城市遷移。隨著改革往縱深發展，進出口貿易的躍升，外資的大量投入，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不斷鞏固，沿海和內陸以及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距更為加劇，農村往城市遷移的規模日益加大。然而，一般而言，個人的戶籍登記地沒法跟居住地的改變而遷移。數以億計的城市新移民仍然保持原居地的戶籍，不能享受當地市政府提供的住房、醫療、教育、退休保障等福利，在就業以至公共治安保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城鄉二元結構演化成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Chan, 1996）。

難以取得遷入地的城市戶口，是絕大多數人戶分離現象的成因。不過，只有擁有農村戶籍的人口才可以透過農村集體擁有耕作土地，並得以分配為修建本身居所的“宅基地”。為了保持農地的擁有權，也有相當部分長期在城市居住的“農民”不願放棄其農村戶口。這個情況，在城鄉交接地帶的農村尤其普遍。隨著城市發展和耕地被徵用，當地的農民紛紛利用其宅基地修建多層住宅，並把多餘的空間，出租予從全國各地湧來的農民工。過去的農村被城市包圍，成為“城中村”，並在整

個九十年代和 2000 年代初，單位和市房管局仍為城市住房的最主要提供者的情況下，為城市新移民提供解決居住問題差不多唯一渠道（Wang et al, 2009）。以原城鄉交接部的農民，作為城市新移民和其他地下層人口的一個主要提供者，也可算是改革開放下中國城市的一個特有現象。

規模與速度的函義

中國與西方城市發展另一個突出差別，是中國的城市轉型或城市革命的規模。當然，這是建基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以及改革開放後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們前面提到近年來中國湧現大批超大城市和巨型城市連綿區 (mega-urban region) 的龐大數量和規模。根據最新發佈 2010 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 50%；也就是說，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已超過 6.6 億⁷。這個數字，比歐盟的總人口還多。再者，在未來十年內，將有 2 億至 3 億的新增城市人口。這種規模的城市人口增長對城市住房、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以及城市經濟活動所產生的需求、自然生態環境的壓力等，都大大超越以西方發展經驗為藍本的城市研究範圍之內。以私家車為例，隨著收入增長，在中國，汽車開始普及到一般家庭。由於基數龐大，私家車的使用，勢將大大增加碳排放，加劇全球暖化。同時，個人生活和消費模式由於私家車的普及，也將產生深刻的變化，從而改變全球範圍的生產配置。

四、結語

對中國像謎一樣的城市和空間轉型作出合理的解釋，並探求這一現象對其他地區的意義，無疑是擺在城市和經濟地理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面前一個日益迫切的課題。當今，全球政治經濟正處於一個新的轉接點，中國勢將超越美國，重新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過去兩百多年西方主導世界經濟版圖制定的歷史，將會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其中，以中國為基地的跨國企業開始冒起，並衝擊一直以來，

⁷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665,575,306 人，占 49.68%。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 年 4 月 28 日。

以西方跨國企業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機制。在這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更以世界發展史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挺進。這等等，都說明城市與經濟地理學以及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有需要納入當代中國的發展經驗，包括中國與西方工業先進國家的互動過程，如何相互影響各自的空間經濟和城市發展路徑，才能夠有比較完整的論述。以上浮光掠影的討論，雖然膚淺，相信也足以展示比較研究，特別是比對中國和西方的城市與區域發展歷程和推動的機制，對城市和區域研究理論深化的重要性。

香港在促進東西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再者，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特別是對學術自由的尊重。香港在進行類比研究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創建於 1995 年，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作為香港浸會大學的一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中心，二是構建一個包括 28 所成員大學的研究平臺，從而協調和促進學術交流及設置合作研究專案。目前，研究所的科研活動專注於以下三個領域：城市化和人口流動性研究；環境、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研究；以及跨文化研究。城市與區域的對比研究歸屬於第一和第二個研究領域。我相信，透過我們的努力，以中國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城市與區域研究，能夠融入並充實主流的城市與經濟地理學以及相關的社會科學。

參考文獻

- Alonso, William 1964. The historic and structural theories of urban form: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rban renewal. *Land Economics*, XL, 227-231.
- Boyreau-Debray, Genevieve & We, Shang-Jin 2005. 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 The case of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Brenner, Neil, Jessop, Bob, Jones, Martin & MacLeod, Gordon (eds.) 2003. *State/Space: A Reader* Malden, Oxford, Carlton, Berlin: Blackwell Publishers.
- Breslin, Shaun 2006. Serving the Market or Serving the Party: Neo-liberalism in China. In: ROBINSON, R. (ed.)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Forging the Market Sta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hen, Jie 2007.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real challenge to soil protection and food security. *CATENA*, 69, 1-15.
- Chu, Yin-wah & So, Alvin Y 2010. State neoliberalism: The Chinese road to capitalism. In: CHU, Y.-W. (ed.) *Chinese Capitalisms: Historical Emergence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Dicken, Peter 2011. *Global Shif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Evans, Peter B 1997.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 62-87.
- Fröbel, Folker, Heinrichs, Jürgen & Kreye, Otto 1982.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Thomas L. 2005. *The World in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Fujita, Mahahiaa & Ogawa, Hideaki 1982. Multiple equilibria and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non-monocentric urban configuration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2, 161-196.
- Gabriel, Satyananda J 2006. *Chinese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ist Vi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laeser, Edward L. 2008.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Cities*.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 Guo, Shen & Li, Chen 2011. Excess Liquidity, Housing Price Booms and Policy Challenges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19, 76-91.
- Harvey, David 1989.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 3-17.
- Harvey, David 2011. Crisis, Geographic Disruptions a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Responses. *Economic Geography*, 87, 1-22.
- Heikkila, Eric J 2000. *The Economics of Planning*. New Brunswick,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Center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
- Hsing, You-tien 2010. *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Yasheng 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tton, Will 2006.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 Free Press.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1: Tensions from the Two-Speed Recovery Unemployment, Commodities, and Capital Flows. Washington DC.
- Kornai, Janos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3-30.
- Kornai, Janos & Qian, Yingyi 2009. *Market and Socialism: In the Light of the Experiences of China and Vietna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Liew, Leong 2005. China's Engagement with Neo-liberalism: Path Dependency, Geography and Party Self-Reinven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1, 331-352.
- Lin, George C. S 2009. *Developing China: Land, Politics, and Social Conditions*, Oxford, Routledge. .
- Lum, Thomas 2006. Social Unrest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Reports and Issue Brief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Cornell University.
- Martin, Ron 2011. The Local Geographi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rom the Housing Bubble to Economic Recession and Beyond.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1, 587-618.
- Mills, Edwin S. 1967.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an Are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197-210.
- Mittelman, James 2000. *The Globalisation Syndro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olotch, Harvey 1976.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309-332.
- Muth, Richard 1969. *Cities and hous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residential land u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onini, Donald M. 2008. Is China Becoming Neoliberal?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8, 145-176.
- O'Connor, Justin 2009. Shanghai Moderne: Creative Economy in a Creative City? In: KONG, L. & O'CONNOR, J. (eds.) *Creative Economies, Creative Cities*. London, New York: Springer.
- Peck, Jamie & Sheppard, Eric 2010. World Apart? Engaging with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86, 331-340.
- Peet, Richard 2007. *Geography of Power: Making Global Economic Policy*,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
- Pei, Minxin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Qin, Hui 2005. Economic transition, social justice, and democracy. *The Chinese Economy*, 38, 3-54.

- Qin, Hui 2010. Rise of China and rise with China-style (中国的崛起和 “ ‘中国模式’ 的崛起”). *Caijing*. Dec 01 2011 ed. Beijing: Caijing Magazine.
- Sassen, Saskia 2001. Global cities and global city-regions: A comparison. In: SCOTT, A. J. (ed.)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askia 2006.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Allen J 1998. *Regions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Coming Shape of Global Production*,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Allen J, Agnew, John, Soja, Edward W. & Storper, Michael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In: SCOTT, A. J. (ed.)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ao, Min, Tang, Xiaoyan, Zhang, Yuanhang & Li, Wenjun 2006. City clusters in China: air and surface water pollution.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4, 353 – 361.
- Stone, Clarence N. 2005. Looking back to look forward: reflection on urban regime analysis. *Urban Affairs Review*, 40, 309-341.
- von Hayek, Friedrich August 2005. *The road to serfdom*,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Walder, Andrew G. 2011. From Control to Ownership: China's Managerial Revolut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7, 19-38.
- Walder, Andrew G. & Oi, J. 1999.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OI, J. & WALDER, A. G.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deman, Andrew Hall 2003. *From Mao to Market: Rent Seeking,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Market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ss, Linda 1997. Globalis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New Left Review*, 225, 3 – 26.
- Whyte, Martin King 2010.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Teresa 2010.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eung, Henry Wai-chung 2003. Theorizing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Asia. *Economic Geography*, 79, 107-128.
- Yeung, Henry Wai-chung & Liu, Weidong 2008. Globalizing China: the Rise of Mainland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9, 57-86.

- Yusuf, Shahid, Nabeshima, Kaoru & Perkins, Dwight 2007. China and India Reshape Global Industrial Geography. *In: WINTERS, L. A. & YUSUF, S. (eds.) Dancing with Giants.* Washington: Worldbank
- Zhou, Ruijin 2010. The threat of power-elite capitalism is increasing (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越來越大) . *FT China*. Dec 14 2009 ed. Beijing: FT China.
- Zhu, Jieming 1999. Local growth coalition: th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a's gradualist urban land refo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3, 534-548.